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中国 近代 通史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第十卷

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5-1949)

汪朝光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

张海鹏 主编

中国 近代 通史

ZhongGuo JinDai TongShi

第十卷

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5-1949)

汪朝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5~1949/汪朝光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214-09755-2

I. ①中… II. ①汪…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
1945~1949 IV. ①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 第 143163 号

中国近代通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张海鹏 主编

第十卷 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

汪朝光 著

责任编辑 张 凉

责任编辑 王列丹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奥能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 毫米 1/32

印 张 187.125 插页 40

字 数 5435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2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755-2

总 定 价 800.00 元(共十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战与和的变奏	1
第一节 国共重庆谈判	1
第二节 边打边谈	12
第三节 国共停战与政协会议	23
第四节 政治协商进程之顿挫	33
第五节 东北局势的演进	51
第二章 全面内战的烽火	72
第一节 军事调处的失败	72
第二节 国共双方的军事动员	81
第三节 国民党的全面军事进攻	93
第四节 国共关系的最终破裂	112
第五节 国民党的重点军事进攻	123
第三章 战后社会的动荡与纷扰	146
第一节 怨声四起之接收与复员	146
第二节 此起彼伏的学潮	157
第三节 中间势力的活跃与分化	175
第四节 国民党一党制宪之纷争	189
第五节 地方与边疆问题	212
第六节 经济恢复重建之困难	223
第七节 胜利后的弱势外交	243
第四章 国共两党攻守态势的转换	255
第一节 国共军事攻守之易位	255

第二节	国民党实行“戡乱动员”	267
第三节	国民党统治之衰颓	280
第四节	“训政”终结与“行宪”开场	290
第五节	一败涂地的币制改革	308
第六节	国共内战与土地改革	323
第七节	中共力量的全面崛起	336
第五章	国共两军的军事决战	348
第一节	决战前的国共两军争夺	348
第二节	豫东战役与济南战役	364
第三节	辽沈战役	373
第四节	淮海战役	392
第五节	平津战役	417
第六章	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	442
第一节	蒋介石引退与李宗仁登台	442
第二节	北平和谈	454
第三节	渡江战役与淞沪战役	468
第四节	国民党军事的全面败退	481
第五节	国民党撤离大陆退守台湾	514
第七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527
第一节	中共建国的理论准备	527
第二节	中共建国的实际准备	538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549
主要参考文献		562
人名索引		586

第一章 战与和的变奏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发展与进步的机遇。但是,当时执政的国民党与在抗战中得到空前发展的共产党对战后中国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考量与选择。国民党企图继续维持其一党执政的统治地位,排斥中共的政治参与,力图遏制中共的发展;中共提出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两种不同的建国主张表现为两条不同的政治道路,国共两党在战时的合作关系亦因抗战结束而开始发生变化,对立的一面在上升,共同的一面在下降。但抗战胜利之初的国内外环境、民众对和平的渴望、美苏两强对中国政治的态度,有利于和平而不利于战争。国共两党也需要根据时局演变,决定战后政策,作出适当部署。因此,国共两党关系并未骤然破裂,而是在边打边谈的战与和的变奏曲中发展与演进,经过重庆谈判、停战谈判、政治协商会议,国共两党关系一度有所缓和,国内和平局面也得以暂时维持。

第一节 国共重庆谈判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最后胜利。但是,胜利的狂欢过后,战时中国积累的问题,如凋敝民生的救济、残破经济的重建、文化教育的发展等亟待解决。尤为重要的是,如何整合社会各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对建设国家的不同

意见,使中国得以继续坚持抗战时期的全民族团结,是战后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中国全民族团结的基础因抗战而奠定,亦因胜利而变化,即从以抗战、以民族生存求团结而转向以民主、民生求团结。对于如何巩固抗战胜利成果,如何加速民主化进程并改善民生,以建设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当时左右着中国政局动向的两大党——国民党和共产党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1945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目前时局宣言》,号召“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宣言提出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和军队、承认各党派合法、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六项具体要求,从而率先公开了自己的政治立场。9月3日,国民党发布《告全国同胞书》,对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未正面回应,而着重就战后复员问题提出具体主张,如为军人安排就业的机会,为难民取得必需的救济,为城市乡村策复兴,为海外侨胞谋复业,为青年解决求学的困难,为工商各业开拓发展的道路。对于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民主宪政问题,《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加紧造成地方自治,切实保障人民权利,从速成立民意机关。但蒋介石在同日发表的广播演讲中特别强调: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而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军队国家化,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①蒋介石的意图所向显然是针对中共。战前和战时积累的国共两党矛盾,非但未因抗战胜利而得以缓和,相反,抗战胜利更使原本潜伏的两党矛盾浮出水面,在一系列问题上国共两党的主张针锋相对,国内政治局势因两党对立而趋紧张。

国共两党在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即以准备受降接收、确定自身战略优势为中心,作出各自的部署。日本决定投降的消息刚刚传出,8月10日晚,蒋介石即电令各战区:迅即展开接收部署,同时警告

^① 1945年8月27日《解放日报》;《抗战胜利后重要文告》,5—13页,中国国民党河北省党部,1945。

敌军不得向我已指定之军事长官以外的任何人投降缴械,并确保联络和掌握,以待国军到达。为不使中共因参与受降接收而得到好处,增加未来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本钱,蒋介石完全排除了中共参与接收的权利与可能。11日,蒋介石致电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在各战区作战地境内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蒋介石还指示负责接收的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对于非经政府指定之受降部队,如有擅自接受敌军投降,企图扰乱受降计划者,得下令惩罚之。^①蒋介石的命令不考虑中共部队在对日作战中的重大贡献,自然不为中共所理会。就在蒋介石致电朱德的当天,中共以延安总部名义命令:“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交通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受,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②因为中共部队多在敌后,靠近日伪占领区,中共力图通过受降接收扩大占领地盘,尤其是将华北各主要通路地区均划为应占领的地区,从而与国民党垄断受降接收权并恢复其对全国统治的意图产生尖锐的矛盾。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却连发三电,邀请中共领袖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一时轰动中外。蒋介石的邀请虽出人意表,但究其实质,无非和战两手之不同运用。一方面,在国民党内,以陈果夫、陈立夫等为代表的CC系党务系统,以邹鲁、居正等为代表的国民党传统右翼,以陈诚、白崇禧等为代表的军事系统,忧惧中共力量的迅速成长,主张对中共采取强硬态度,并为此不惜破裂而一战。8月20日,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讨论中共问题,其中不少人主张对中共绝无妥协余地,只有用武力对付。另一方面,国民党内以张群为代表的政学系官僚和在蒋介石身边任职的亲信部属宋子文、张治中等人则认为,单凭武力不足以压服中共,主张与中共谈和,在继续维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承认中共并将其约束至体制内,以求得国内和平。作为国民党

① 秦孝仪:《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785页,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78;《日本投降后中共动态资料汇编》,48页,19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6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89。

② 1945年8月11日《解放日报》,延安。

的最高决策者,蒋介石总是根据不同的考虑而决定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抗战甫胜之时的国内外形势,显然不利于国民党贸然动武。不仅远在后方的国民党军队尚未部署到位,社会各界强烈主和,而且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美国也因雅尔塔体系的约束而支持国共和谈。在此种形势下,蒋介石适时运用和的一手,在部署军队向全国主要交通线和要点要地进军、抢占有利战略地位的同时,电邀毛泽东赴渝,意图在政治上占据主动。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组长唐纵在其拟订的对日本投降的处置意见中建议:邀请“中共领袖来渝共商进行。如毛泽东果来则可使其就范,如其不来,则中央可以昭示宽大于天下,而中共将负破坏统一之责。”此份建议虽出自蒋介石的幕僚之手,但显然对蒋介石的意旨有深切体认,更毋宁说是蒋介石的真实想法。为此,8月14日、20日、23日,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言辞谦恭地表示“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并表示“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①

对于和战两手的不同运用,中共同样娴熟于心。日本投降之初,中共本已考虑在新形势下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因为国民党在受降等问题上不愿妥协,使中共估计蒋介石邀毛泽东赴渝不过是欺骗手段,对此并不积极。但在蒋介石连续电邀毛泽东赴渝并得舆论好评后,中共的态度有了重要变化。同时,与美国支持国民党谈和相一致,苏联也在毛泽东决定赴渝之举中起了重要作用。当中共对是否接受邀请有所犹豫时,斯大林两次致电毛泽东,敦促其接受邀请,赴渝谈判。周恩来1960年7月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说:“8月22日,斯大林用苏联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打电报给毛主席,要求我们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不要进行自卫反击,否则中国民族要毁灭。斯大林还要毛主席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订立停战协定,成立联合政府。当时中央在讨论

^① 唐纵:《在蒋介石身边八年》,688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45年8月16日、21日、25日《中央日报》,重庆。

斯大林的意见时,没有一个人赞成毛主席去重庆。……后来斯大林又来了一次电报,仍然强调上述意见,一定要我们去重庆。他认为如果我们要对国民党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美国就会用飞机、大炮、海军帮助国民党,苏联也得受中苏友好条约的束缚,在道义上支持国民党政府。他就是给我们这样大的要挟,硬是要我们同意接受和平谈判。中央反复讨论以后认为,苏联这样做是没有道理的,但是也要考虑到中国已经打了八年抗战,人心向和,希望能够有一个和平环境建设国家,医治战争创伤,人心思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果拒绝和平谈判,很显然是不策略的。所以中央,特别是毛主席,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可以去谈判。”尽管中共领导层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看法未必认同,但斯大林的态度对他们毕竟有重要影响。而且由于美国在华力量的增长及其与国民党的关系,毛泽东认为美国的影响对国民党能够起决定作用,美国既已对和谈表示支持,则中共自不能完全置之不理。^①

8月23日,中共在延安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关系及如何应对蒋介石之邀请等问题。毛泽东认为:因为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如兵力分散、矛盾很多、实力不足),解放区的存在,共产党不易被消灭,国内人民和国际上反对国民党打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和必须避免的。他强调:“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存在,他还需要医好自己的创伤,壮大自己的力量,以便将来消灭我们。我们应当利用他这个暂时和平时期。”“以后我们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到团结,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在数量上作些让步,以取得合法地位,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来迎接新形势。对这种让步我们要有准备。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准备在合法工作中去进攻,利用国会讲坛去进攻,要学会作合法斗争。”与会的中共领导人均支持他的意见,认为中共应争取主动,迫使蒋介石妥协。8月25日,毛泽东将其准备赴渝的信息通过中

^①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308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吴冷西:《十年论战》,321—32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转达蒋介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正式决定毛泽东赴渝谈判。毛泽东强调:只有去才能取得全部主动权,“谈判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只有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方能达到妥协。”“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和外国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会议决定:中共在北方从陇海路到东北一定要占优势,但在南方从广东到河南、江南、江北地区,可视情形作出次第让步。同日,中共发出党内通知,认为“现在苏美英三国均不赞成中国内战,我党又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但同时强调“在我党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①至此,中共确定了力争和平,但亦作好武力准备的方针。

1945年8月28日,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陪同,飞抵重庆。在民国史和国共关系史上均具有重要意义的重庆谈判由此拉开序幕。

在重庆谈判开始之前,国民党为了应付谈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在8月25日由潘公展主持国民党中央联席会报秘书处会议,提出谈判意见,基本策略为军事拿紧,政治放松;态度上不予刺激,推诚相待;一切采取主动,应放开者先放开;将商谈情形逐日公布,充分表露我方委曲求全忍让之苦心,使中外对我同情;但随时准备破裂,同时提防各党派勾结,绝不让其他党派参与此次商谈。关于谈判的具体方案,他们提出:应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商谈之前提,军事从严,政治从宽;在政治体制上,放弃训政时期以党统政的形式,采用控制从政党员的方式,即以行政院为类似责任内阁之组织,立法、监察机关可容纳中共及各党派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4—9、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毛泽东选集》缩印合订本,1051—10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

人员;但所谓解放区不能存在,中共之政治人员,在绝对遵照政府法令条件之下,可酌量委充地方官吏。29日,潘公展另函呈蒋介石,提出国民党可以酌量容许的解决办法为:整编后的中共军队不许特殊化,惟整编之数不妨量予提高;中共政权组织应一概取消,中共军队不听命令等行为,应一律严令停止;国防最高委员会改设政治会议,此中自可容纳中共分子;行政院设政务委员会,酌量容纳他党人士;国民政府委员会或军事委员会委员,亦可酌选中共或他党参加二三人。他认为:“钧座对此顽梗之中共问题,苦心焦虑,非常人所能想象。今幸以德威之感召,毛泽东居然来渝,此诚解决本问题之最后良机。要宜持之以坚,容之以忍,终求大功之告成,悬案之终了。万不可商谈而后,初步解决其一部分问题,而更贻将来无穷之患。”在综合党内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蒋介石指示国民党代表在谈判中采取的原则为:军事绝对统一,政治尽可宽大,不妨次第让步,以示一再容忍,务取宽大,达成妥协求全之任务。^①虽然蒋介石有所谓“政治宽大”之表示,但在此后的实际谈判进程中,国民党固然要求军事之绝对统一,即使对“政治宽大”也未见实质让步。

重庆谈判,名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谈判,两人亦有多次会见,并为谈判决定原则,但实际谈判主要是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张群、张治中等之间进行的。9月3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中共的谈判方案,表示中共愿“在和平、民主、团结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同时表示“拥护蒋先生,承认蒋先生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方案提出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合法、承认解放区政权及部队、严惩汉奸、重划受降地区、停止武装冲突、结束党治、保障人民自由等要求。方案的核心内容为提出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必要办法。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要求召开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会议,讨论建国大计、施政纲领、改组政府、重选国大等问题;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承认中共解放

^① 《蒋中正总统档案·特交档案·分类资料(防共):国共协商卷》015卷第3号,台北,“国史馆”藏。

区政权的地位,在陕甘宁边区及热河、察哈尔、河北、山东、山西委任由中共推选之省主席,在绥远、河南、江苏、安徽、湖北、浙江、广东六省与北平、天津、青岛、上海特别市委任由中共推选之省副主席或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中共部队编为16个军48个师,驻地集中在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各部工作;设立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委任中共人员为主任。^①

在得知中共的方案后,9月4日,蒋介石指示国民党谈判代表:(1)军队问题,中共军队最多编12个师,驻地由双方商讨决定;(2)解放区问题,只要中共做到军令、政令的统一,则对县级行政人员酌予留任,省级行政人员亦可延引中共人士;(3)政治问题,拟改组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中央政府俟国大后再予改组;(4)国大问题,已选国大代表仍然有效,中共方面可酌增代表名额。^②蒋介石企图以此解决国共之间的全盘问题,但归结于所谓政令、军令的统一,仍是以对中共的军事收编并交出解放区政权作为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政治参与的条件,与中共强调政治民主化,同时保持对己方军队和解放区控制权的要求恰成对比。国共双方的主张距离甚远,预示着谈判的艰难。

自9月4日起,国共双方就有关问题开始正式谈判。国民党先后参加的有张群、邵力子、张治中、叶楚傖和张厉生,中共则始终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参加。对于中共所提方案,国民党代表认为,军队问题与前此所谈距离甚远,而解放区问题如照中共意见,非导致国家于分崩离析之局不止。中共代表则认为,要解决国共两党问题,必须承认两党皆有军队和政权的现实,否则便无法再谈。周恩来特别提出:我党对于国民党,已作重大让步,军权政权,中共皆承认国民党为中国第一大党,然国民党亦不能抹杀共产党,故国民党亦必须为我党打算,方能使我们两党各得其所。鉴于双方在有关军队和政权的大原则上意见暂

^① 《毛泽东文集》第4卷,20—21页。

^②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825—826页。

无法保持一致,张群遂建议,从讨论具体问题入手,以期会谈有所进步。此建议得到周恩来的赞成。在关于具体问题的讨论中,双方先在召开政治会议和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问题上达成了初步妥协;次在军队问题上,中共军队保留20个师成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有达成协议的可能。惟一难以解决的是关于解放区的地位问题。国民党坚持,中共只能推荐省级行政人员,由中央择予任用;而中共则坚持国民党对解放区现状应予以一定程度的认可。中共总结谈判进程为:“蒋表面上对毛周王招待很好,在社会上造成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实际上对一切问题不放松削弱以致消灭我的方针,并利用全国人民害怕与反对内战心理,利用其合法地位与美国的支持与加强他(保障美国在远东对苏联的有利地位),使用强大压力,企图迫我就范,特别抓紧军队国家化问题。因此在谈话态度上只要求我们认识与承认他的法统及军令政令的统一,而对我方则取一概否认的态度。”^①

为了早日达成妥协,9月19日中共主动提出,其在南方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豫南八个地区的军队第一步可以撤至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地区,第二步再撤至鲁、冀、察、热、晋省之大部分、绥省之小部分与陕甘宁边区;解放区亦随军队驻地而合一,即鲁、冀、察、热省主席和晋、绥省副主席及平、津、青市副市长由中共推荐,省区数量较之原提方案大幅度减少。然而国民党仍拒作让步,甚至连一向与中共关系友好的张治中也表示政府殊难考虑中共方案,指责中共此举为割据地盘,引致双方激烈争辩,谈判气氛紧张,不得不暂时停顿。中共甚至还得到情报,称国民党中央要员私下透露,蒋介石将以常有国事咨询为由,不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以动摇中共军心,以利于国民党的进攻。因此,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谈判没有结果,形势可能逆转,毛泽东再留重庆似无必要,建议毛泽东争取尽快回延安。

虽然如此,国共双方都无法承担谈判破裂的政治责任。蒋介石吁

^①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76—27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992。

衡国内外形势：“俄是否因此借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果尔，则国际形势犹能容忍否？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在对美、苏动向尚无把握的情况下，他决定“不能不为国相忍”。^①而毛泽东审时度势，亦决定仍留重庆，争取社会舆论与中间派，以取得政治主动权。他特别告诉《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我们对国民党，只是有所批评，留有余地，并无另起炉灶之意。由于中共“调子低，让步大（允逐步退出陇海路以南），表示委曲求全”，9月27日谈判恢复，双方同意由军政部、军令部和中共另行讨论军队数量与整编等问题，而对解放区政权问题仍无法达成妥协。中共提出的在省级行政区划基础上维持解放区政权的各种方案均为国民党拒绝，国民党只能同意在县级，至多是地区级行政区划基础上承认中共政权的可能性。周恩来的看法是：“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②国民党最忌讳的，也是最担心的，就是中共合法地取得政权并拥有军队。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一直无法接近，最后只能暂时维持现状，并同意先将商谈结果以公报形式公告中外。

10月10日，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纪要共12条。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双方一致认为：中国抗日战争业已胜利结束，和平建国的新阶段即将开始，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认同蒋主席所倡导的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双方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限制特务机关活动、释放政治犯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①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8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293页；《周恩来选集》上卷，2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意见;在实行地方自治、惩处汉奸、解散伪军、重划受降地区等问题上,政府方面表示实行地方自治不应影响国民大会之召开,惩处汉奸要依法律行之,中共参加受降在其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双方同意提交政协解决;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提出将部队缩编至20个师,自8个地区撤出部队至陇海路北和苏北、皖北,政府方面表示此次商谈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军队数目可以考虑,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提出方案,双方同意由军令部、军政部及第18集团军各派一人组成三人小组,进行具体商谈;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先后提出四种方案,政府方面均不同意。对于未解决的问题,双方表示将在互信互让的基础上继续商谈,求得圆满之解决。^① 协定签订前后,蒋介石与毛泽东多次相见,表示“国、共非彻底合作不可,否则不仅于国家不利,而且于共党有害”。但蒋介石又要求中共“对国内政策应改变方针,即放弃军队与地盘观念,而在政治与经济上竞争,此为共党今后惟一之出路”;“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之意,坚决表示望其了解”。^② 可见蒋介石耿耿于怀的仍是如何解决中共的地盘与军队问题。蒋介石还以推心置腹之态对毛泽东说:我们两人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我们都是五六十的人了,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对蒋介石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不为党派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应该帮助。^③ 军队和根据地对于中共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也是中共和国民党相争的主要依靠,毛泽东当然知道蒋介石的心思,也当然不会为蒋介石的言辞所动。中共中央在就重庆谈判下发给各地的指示中强调:“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目前伪军未解散,敌军未

① 1945年10月12日《中央日报》,重庆。

②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845—848页。

③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4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缴械,解放区问题未解决,谈不到编整部队问题。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①

“双十协定”的意义,并不在于国共两党达成了什么妥协。实际上,由于国共两党多年的对立与分歧,两党对国内外形势与自身利害考量存在差异,双方的矛盾不可能通过一次谈判而解决,协定达成的实际妥协十分有限(最具意义的妥协是召开政协),同时具体而细微地列出了双方对于各项问题看法的异同点。“双十协定”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会见并发表公报的形式,中共承认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国民党也承认了中共及其军队的地位,双方都可以从这样的表述中获得己方认可并需要的东西。但因为中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此次会谈采取了双方平等的形式,签订了正式协定,中共的地位被首肯,因此相比较而言,中共对协定的评价更为积极。毛泽东在回延安后一度认为: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无论如何,“双十协定”对于国共而言,虽然形式效应远大于实际内容,双方对于诸多已决和未决问题仍是各说各话,但毕竟缓解了一度似乎迫在眉睫的内战危机,对于刚刚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苦难与艰辛、迫切期待国家重建与复兴的民众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

第二节 边打边谈

国共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的签订,虽使大规模内战暂时未能公开爆发,但并不意味着国共军事冲突的停止。因为国共双方均企图在军事上占据更多的实地,得到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从而在政治上为未来的斗争作出对自己更有利的布局,这导致双方的军事冲突不但无法停止,反有扩大之势。一时间,中国大地呈现出一幅不相协调的画面: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324—325页。